

也能尊重彼此間不同的見解，在這基礎上開拓亞洲與西方關係的新紀元。

英國詩人吉卜林說過：「東方就是東方，西方就是西方，雙方不可能會合。」但今天我們有理由相信，東西文化會合融和是指日可待的。

傅高義(Ezra F. Vogel)
哈佛大學社會學系教授

期待更高的綜合

陳伯海

作為一個文化人，從思想文化發展的角度看問題，我所期待於二十一世紀的是甚麼呢？要說清這一點，不能不稍作歷史的回顧。

眾所周知，十九世紀是人類思想文化進程上的一個輝煌時代，它把前此數百年間人類創造的精神文明作了一番綜合，諸如唯理論與經驗論、現實主義與邏輯主義、人文思想與科學思想、現實主義與理想主義之類矛盾傾向，在它那裏都得到合理的繼承與發揚，連結為一個整體，於是十九世紀成了人類文明演進的高峰。

奇怪的是，繼此而來的二十世紀，並沒有沿着這條成功的路子走下去。打一開始，它就站到了十九世紀的對立方面，以否定十九世紀的基本路線為自己的出發點。比如說，進化論是十九世紀思想文化的一大主潮，它所包含的歷史發展的觀點為當時學術界普遍承認，而二十世紀興起的結構主義，從索緒爾到列維-斯特勞斯，則以共時性結構來排斥歷時性演進，影響及於語



言學、心理學、文化人類學和文學等眾多領域。十九世紀的另一代表性思潮為崇尚理性，它是德國古典哲學、法國空想社會主義學說和各門自然科學的共同思想基礎，但二十世紀佔有勢力的潮流卻是非理性主義，生命哲學、存在主義、弗洛伊德心理學、斯賓格勒史學以至各種神秘性宗教泛濫即其典型。就以文學創作及批評而言，現代主義反抗現實主義，「本文」取代「人本」，也是有目共睹的事實。二十世紀與十九世紀「對着幹」，從總體上說是可以成立的。

「對着幹」有甚麼結果呢？其積極的意義是繞過了十九世紀那難以為繼的高峰，於前人不經眼的地方開闢出大塊處女地，吸引着人們去從事新的耕耘，這是思想文化變革的重大契機。但「繞過」不等於「征服」，一味排斥十九世紀而未能盡力消化、吸收其成果，致使二十世紀的創新在許多方面帶有片面性，這又是其消極的因素。後面這個弱點似乎開始引起了注意。拿晚近的趨勢來說，系統演化論的形成，發生學心理學的建立，新歷史批評的出現，在在顯示出向歷史主義回歸的跡象：當然不會是簡單的回歸，其中仍保留着結構分析的要素，是歷時性與共時性兩種不同思維方式的新綜合。這是否預示着人類精神文明創造所面臨的前景呢？

歷史常按照黑格爾老人指示的「否定之否定」規律而運行着。思想文化的軌迹，在經歷了十九世紀和二十世紀這一正一反的對立運動之後，伸向二十一世紀，我期待着更高綜合的實現。

陳伯海

上海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所長、研究員